

学的力度¹。所有这些都使赫鲁晓夫时期在民族关系方面的“解冻”政策成果化为乌有。

再次，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是密切关联的。赫鲁晓夫在推行新的本土化政策的同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早在1954年，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就通过了两个反教会倾向明显的苏共中央决议：《关于科学的无神论宣传中的严重缺陷及其完善措施》和《关于在居民中进行科学的无神论宣传的错误》。按俄罗斯有些教科书的说法，这两个文件毫无疑问地标志着当局与教会的“黄金十年”的结束，使国家后退了20年，回到了“不信神的五年计划”时期²。自上个世纪50年代末起，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反宗教运动使得阿塞拜疆的很多清真寺关闭及伊斯兰教神职人员遭到压制。作为回应，部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开始公开地进行对抗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共和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发现，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布道时在信徒中“鼓动民族主义情绪”。沙利梅托夫（Шалиметов）毛拉1962年在聚集了大量人群的地方进行布道时，为使“各民族摆脱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祈祷³。反宗教运动与发展各民族文化的本土化政策也是相矛盾的，也不可能使本土化政策取得应有的效果。

最后，为被强迁民族平反，恢复被强迁民族的权利，对重塑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争取少数民族对政权的支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赫鲁晓夫只考虑到满足被强迁民族的利益和要求，没有考虑被强迁民族的回迁地的新居民的处境，没有考虑到恢复某些被强迁民族的民族国家建制所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这就使旧的民族矛盾没解决，又增加了新的矛盾，使民族关系、民族矛盾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解决。这也使赫鲁晓夫的改革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论 文】

当代俄罗斯史学界研究苏联民族关系史的特点⁴

刘显忠⁵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由于新史料的解密，方法论的改变，国家制度的变化，当今俄罗斯的历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就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而言，以前不太为人关注的“俄罗斯人”问题受到了普遍关注；对列宁斯大林在成立联盟问题上分歧的认识、苏联的联邦制问题的认识都发生了变化；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论断也受到了质疑。

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随着时代的变化，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及新的研究方法的出现，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苏联史研究中表现非常明显。本文仅谈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变化。

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变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就出现了。不过改革之初的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仍旧坚持列宁的国家民族政策和构建联邦制的多民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国家方案的必然性和进步性，仍旧坚持列宁方案的巨大国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理论遗产本身，基本上仍旧被看作是人文知识和政策的基本理论基础，是依然符合现实社会发展条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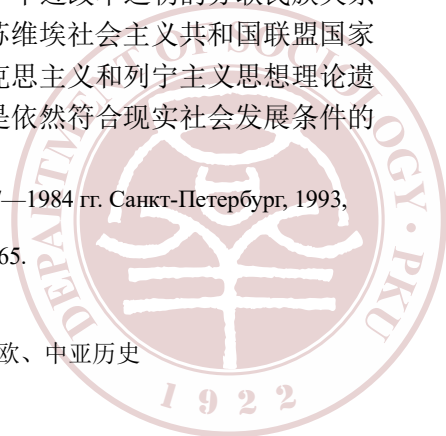
¹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 Зерна и плевелы :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84 гг.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115.

² Под ред. Щагина Э.М.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сква, 2004, с.265.

³ Пыжиков А.В. Хруще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Москва, 2002, с.206.

⁴ 本文刊载于《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东欧、中亚历史



理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研究民族问题的新方法的一些明显特征，首先出现在“真正民主的”、“革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框架内，这种观念要求修正过去的“变形”、使民族领域最大限度地人道化。从这样的立场重新认识苏联各族人民所走过的道路，从历史文化进程及弄清社会经济和民族因素的相互关系、分析民族现象本身的视角，审视他们的合作。¹ 只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发生明显的观念上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俄罗斯人”问题受到关注

苏联时期，由于列宁提出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的监狱”，大俄罗斯人因此就被塑造成了这座“监狱”的积极建造者，是“压迫”国内其他民族的民族，他们要弥补给各民族造成的损失。因此，“俄罗斯人”问题既不为苏联历史学家关注，也没有引起西方历史学家的注意。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的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不再提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而是强调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的利益在苏联时期曾遭到了忽视。

这一方面表现为近年来出版的一些高校历史教科书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开始关注俄罗斯人的权利。如在夏金(Э. М. Шагин)、卢布科夫(А. В. Лубков)主编的高校历史教材中明确指出：“人口最多的俄罗斯人在苏联恐怕是最无权的。”² 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前所长萨哈罗夫(А. Н. Сахаров)主编的教科书也指出：“在30年代之交联盟中央逐渐吞噬了俄罗斯自己的国家组织。”此书强调指出：“尽管苏联的1936年宪法以及在其基础上确立的1937年俄罗斯联邦宪法形式上宣布，俄罗斯联邦也像每一个加盟共和国一样，保有自己的主权，独立地行使国家权力，而实际上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权力和机会极为有限。完全处于联盟领导人管辖之下的重工业的任何一个具体部门，都没有列入俄罗斯联邦政府的权限之内。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没有自己的机构，它完全从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³。

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些历史学家在著作中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如莫斯科大学历史系的巴尔先科夫(А. С. Барсенков)在《民族关系中的俄罗斯人：关于克服陈规》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在革命前时期必须消灭俄罗斯人压迫的口号在反对当时体制的斗争中要起到并的确起到了动员的作用，那么在1917年十月后，在已经确立的‘俄国是各民族牢狱’的观念框架内俄罗斯族和其他民族的对立未必有丝毫的根据。要知道，把俄国变成‘各民族牢狱’的基础不是其疆域的扩大及新的民族纳入其版图，而是对各族劳动人民的独裁专横的加强。尽管如此，甚至‘原被压迫民族’这个概念还纳入了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整个民族都被看成是统一的，没有被划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因此沙皇政府对民族关系领域所犯的罪行所负的责任转嫁到了整个俄罗斯民族的肩上。宣布它对其他民族有罪，提出它有义务赎‘祖传下来的罪孽’的问题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俄罗斯族人都具有消极后果。”

他认为，在“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这个词组中，人为地把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国主义和俄罗斯沙文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大国主义是中央领导层对各个共和国事务无一例外地干涉，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么做是“为了俄罗斯人的利益”。大量出现的超民族的官僚主义现象被人们错误地赋予了民族的色彩。由于这个原因，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就扩大到了俄罗斯族人的身上。⁴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弗多温(А. И. Вдовин)认为：“成立苏联时，俄罗斯人实

¹ Зорин В. Ю., Аманжолова Д. А., Кулешов С. В.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умах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1999, с. 24-25.

² 参见 Под ред. Шагина Э. М., Лубкова А. В. Новейш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X-X век. Книга 1. Москва, 2004, с. 408.

³ 参见 Под ред. Сахарова А.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Москва, 2003, с. 530-575.

⁴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в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к преодолению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1991, № 5, с. 73.

际上就被排除在被许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组织、自己的权力机关的各民族行列之外。而自己的民族国家组织和权力机关则可以表达本族人的民族利益并使其不受有无限权力的联盟国家领导人的侵害，使其在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国家组织领导人的关系上处于平等伙伴地位。”¹

他在后来的著作中进一步指出，苏联解体前实际上一直存在的将小民族置于同大民族相比更为优越的条件之下的方针，是苏联民族关系危机的根源，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苏联的解体。“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垮台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都在于国家和俄罗斯人之间的脱节，在于人口最多的民族对丧失了代表和捍卫其民族利益和价值观能力的‘帝国’命运的漠视。……俄罗斯族人自己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²

俄罗斯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В. И. Козлов）教授也是研究“俄罗斯人”问题的著名专家，他在相关著作中也指出：“俄罗斯族在苏联时期的不平等地位首先表现为，在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没有建立俄罗斯共和国，而只有在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人才能像国家的其他大民族一样，拥有享有特权的‘命名’民族的地位及维持其民族生存的相关机构，而且，在建立别的民族的共和国、州和专区时，俄罗斯人在领土方面受到的伤害最大。”他认为，俄罗斯人实际上不平等的另一个标志，是中央的俄罗斯省份对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落后的民族经常提供的粮食、机器以及提供给民族共和国建立工业企业用的其他设备的援助，还经常随同设备派去俄罗斯族专家³。切博塔列娃（В. Г. Чеботарева）在有关苏联民族政策的文章中也详细论述了苏联成立前后党内关于俄罗斯人问题、关于成立俄罗斯共和国问题的争论。⁴也有学者专文讲述了20世纪俄罗斯人历史命运的悖论，他们认为20世纪俄罗斯人的命运是充当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工具。正是俄罗斯人为国家的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又比其他民族的人遭受了更多的战争和镇压带来的苦难；苏联国家整个的社会、经济、民族和其他政策，过去落后边疆区的文明冲刺主要都是靠俄罗斯人的力量实现的。⁵

二、对列宁和斯大林在成立联盟问题上分歧的认识发生变化

苏联时期，评价斯大林与列宁在成立苏联时期的分歧，往往以列宁的观点为标准，只关注列宁对斯大林的批评，而忽视了分析斯大林本人对问题的认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在苏联成立问题上的观点分歧比较大。

一些学者仍坚持以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在原则上歪曲了列宁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民主原则，列宁提出的联盟方案更合理。但有些历史学家开始认为，当斯大林反对“受边疆区民族共产党人游说的”列宁的自由主义，反对列宁为俄国选择的那种不合理的、笨拙的民族国家建设模式时，斯大林更正确。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也受到了一批学者的正面评价，认为它有助于防止有损于俄国政治和经济统一的使俄国按民族“原子化”方式发展的危险。⁶麦德维杰夫（Ж. А. Медведев）就认为1991年的苏联解体证明了“在拟订第一部联盟宪法时缺乏政治远见的是列宁而不是斯大林。”如果“共和国联盟”是按照列宁的方案建立的“欧洲和亚洲苏维埃共和国联

¹ Вдовин А.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0-х годов(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кризис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СССР). См.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8.История.1992, № 4, с.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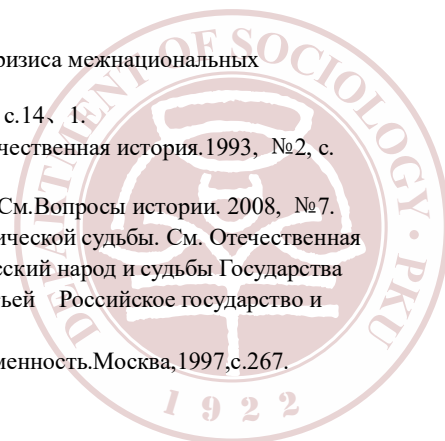
² 参见 Вдовин А. Русские в ХХ веке.Факты, события, люди. Москва, 2004, с.14、1.

³ Козлов В.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национал-сепаратизм 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1993, №2, с. 51-52.

⁴ Чеботарева В.Г. И. В. Сталин и партийно-советск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адры.С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7.

⁵ Котов В. И., Трепавлов В. В.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в ХХ веке: парадокс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судьб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7. №3. с. 58. 关于俄罗斯人问题的文章还有 Печенев В. А. Русский народ и судьбы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Чистяков О. И. “Рус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 См.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Росс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о. ХХвек. Москва, 1999.

⁶ Под ред.Кулешиова С. В.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1997,с.267.



盟（简称 ССРФА），那么，要求对经济进行强硬的中央集权化管理的高速工业化就不可能完成。如果像斯大林方案所规定的那样，组建的只是一个扩大了俄罗斯联邦，而不是一个各个共和国具有形式上的脱离权、而且在“自治”和“加盟”共和国之间还存在着区别的苏联，那么无疑会迅速地导致国家经济、政治和民族的一体化。在迅速俄罗斯化的同时就会真正形成没有民族根基的美国式的“苏联人民”。而这两种方案的混合体最终也没能保证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和民族一体化齐头并进。但“苏联人民”的出现毕竟已经成了一种现实。如果苏联能再存在上 40-50 年，那么“苏联人民”就会像美国人民一样在世界上成为现实。¹

很多学者不再强调列宁和斯大林在建立联盟问题上的分歧，而认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如阿曼若洛娃（Д. А. Аманжолова）和库列绍夫（С. В. Кулешов）在《“民族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列宁和斯大林方案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本质上的差别。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谈的都是国际主义外衣下的一党统治的国家。²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前所长萨哈罗夫主编的教科书中认为：“列宁和斯大林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两种不同观念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策略性。列宁提出的联邦制原则在苏维埃政权处于不稳定状态时适用，因为可以利用民族运动来巩固各地新制度的社会基础。斯大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丧失民族特征和在将来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针。布尔什维克在形式上接受了列宁的联邦制原则，实际推行的是建立单一制国家和逐渐把各共和国的权力缩减到自治水平的斯大林的方针。”³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谢缅尼科娃（Л. И. Семенникова）也认为，“从最终目标来看，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不存在原则性的分歧。分歧出现在联合的策略和方法问题上。”⁴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弗多温把列宁和斯大林在建立联盟问题上的分歧与俄罗斯人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斯大林没有立即同意列宁的建议，大概认为这种方式俄罗斯人首先就不能接受，它有可能加重其在新联邦中的不平等地位。斯大林担心列宁的建议会导致必须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排除 8 个自治共和国，宣布它们也是新联邦独立的、平等的主体。⁵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是，过去由于列宁曾批评斯大林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很多学者都认为斯大林捍卫俄罗斯人的利益。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开始改变这种看法。如 В. И. 科兹洛夫认为，列宁-斯大林民族政策中都存在反俄罗斯倾向，并用“列宁-斯大林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作为自己专著一节的标题。⁶ 他在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有关斯大林保护俄罗斯人的说法没有有力的根据。“消灭富农阶级的全盘集体化运动的斧头给了俄罗斯农民真正致命的一击，尽管他们没有像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那样因饥荒而遭受严重损失，但俄国农村从那时起始终都没能恢复过来，并在持续衰退。斯大林 1930 年代的镇压对俄罗斯人的打击力度也比其他民族大；前不久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1939 年初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 У Л А Г）囚犯中，俄罗斯人占 63%，而当时国家总人口中俄罗斯人才占 58%；俄罗斯人在囚犯中的高百分比后来也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政府也像其他多民族国家的政府一样，关心尽可能广泛地推广民族间交往的主要语言——历史上形成的俄语，而且这也是数百万非俄罗斯族的苏联人所关心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掌握丰富的俄语文化，有助于在向以俄语为主的国家工业城市迁移时更容易适应。只是在 1930 年代末，由于临近的战争的威胁，斯大林才开始在俄罗斯爱国主义中寻找支柱。⁷

¹ 参见 Жорес Медведев,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талин. Москва, 2001.

²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2002, с.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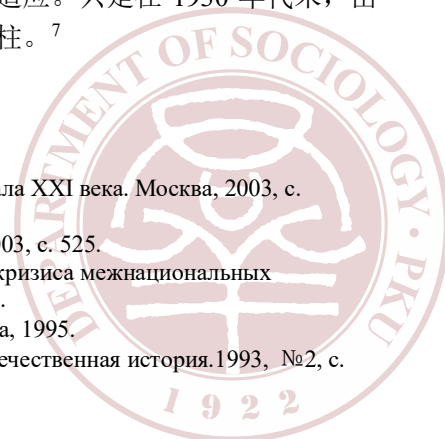
³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Сахарова А. Н.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с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ека. Москва, 2003, с. 527-528.

⁴ Семенникова Л. И. Россия в мировом сообществе цивилизаций. Москва, 2003, с. 525.

⁵ Вдовин 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0-х годов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кризис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СССР). См.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1992, №4, с. 25.

⁶ 见 Козлов В. 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История трагедии великого народа. Москва, 1995.

⁷ Козлов В. И. Национализм, национал-сепаратизм 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2, с.



三、对苏联的联邦制的认识发生变化

苏联时期，大多数学者还都没有对苏联的联邦体制质疑，基本认为斯大林使联邦制变形，导致了民族矛盾。

苏联解体后，一些学者意识到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联邦体制的问题。如有的学者认为：“在神话的‘列宁-斯大林’对立的轨道内研究苏联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是没有前景的”，应当研究实际问题——苏联国家模式的原初矛盾。苏联国家模式是以独立的国家-共和国联盟和自决权、同时又以垄断权力的全国统一的党为支撑的。¹ 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弗多温教授也指出了苏联民族国家体制存在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指出，斯大林的民族国家体制的不足之处就是各个民族及其民族国家组织的等级制，就是其法定的“援助”权和“帮助”义务。他指出，探索摆脱危机的出路不要在回归对当时的历史阶段来说不是毫无意义的过去的老路上进行，“必须放弃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等级，放弃过去赋予各民族的各种各样的等级和名称，放弃对各个民族利益所采取的双重和三重标准，放弃‘本土’民族优先拯救的信念。”² 他认为“在单一制国家的框架内可以更成功地解决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因为在单一制国家内中央可以把自己的部分权力授予民族自治区，而不是相反。”³ 这实际上是指出了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建构的问题。科兹洛夫认为，苏联民族政策的不完善之处在于它没能保证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民族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妨碍了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民族关系。他认为，在沙皇俄国民族问题主要归结为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和人数上处于少数的一些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与波兰人及犹太人的关系特别紧张）。而在苏联，因为在民族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民族共和国之间、共和国“命名”民族和居住在共和国的异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而出现了大量的新的尖锐的“民族问题”。⁴ 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说得更为清楚，“这种由中央示意的民族-国家建设激起了民族的感情，使本来就已酝酿成熟的民族问题尖锐化，并出现新的‘局部的’民族问题。这些新的民族问题有的是由‘命名’民族和中央政权的冲突所决定的；有的是由‘命名’民族和所建立的共和国内的异民族集团的冲突所决定的”。⁵ 这实际上也是说苏联的民族国家建设体制的问题。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季什科夫（В. А. Тишков）也指出了苏联民族国家结构的弊端：“通过赋予各共和国所谓主体民族以优越地位，通过在受教育、成为职业和行政管理人员方面实行优惠和配额制度，民族一致性被固定下来。共和国宪法、国徽和国歌、管理制度、创造性联邦，甚至以共和国科学院为代表的学术机构，变成了民族国家体制威严的象征。通过在身份证上反映民族成分的制度，民族性成了一种社会特征。按这种特征划分各共和国的社会阶层，‘双重少数民族’处在最低层。”⁶ 阿曼若洛娃和库列绍夫也指出了苏联按民族特征实行的联邦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认为以族裔民族主义为支柱的民族国家建设实践只有在确立了极权体制的条件下才能变为现实。思想及它的实际落实、期望及实际结果极为不一致。⁷

四、对列宁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论点的质疑和新认识

52.

¹ 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осква, 2003, с. 28.

² Вдовин 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0-х годов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кризис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СССР). См.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1992., №4, с. 37-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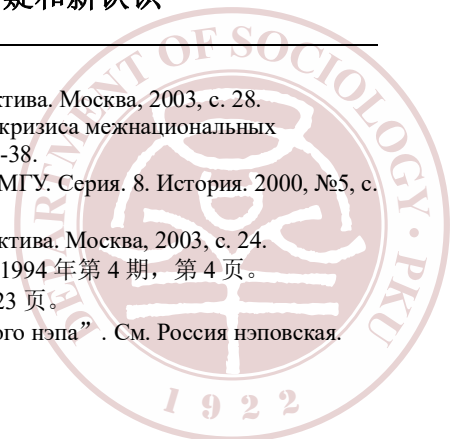
³ Вдовин А. И. Российский федерализм и «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м. Вестник МГУ.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2000, №5, с. 37-38.

⁴ 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осква, 2003, с. 24.

⁵ 科兹洛夫：《民族主义、民族分立主义与俄罗斯人问题》，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4期，第4页。

⁶ 季什科夫：《民族政治学论集》，高永久等译，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⁷ 详见 Аманжолова Д. А., Кулешов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нэпа”. См.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2002.



列宁提出的沙皇俄国是“各民族牢狱”的说法在苏联时期的民族关系史著作中被广泛使用，成了俄罗斯帝国的标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的教科书和论著中开始对这一表述提出了质疑。如在一些教科书中指出，尽管帝俄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存在着不足，但列宁的“俄国是各民族的牢狱”的论断也未必正确。他们认为俄罗斯人在俄国并不享有任何特权，也没有针对大俄罗斯人及其他民族的特殊法律，个别关于“异族人”的法律是考虑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游牧生活的特点。¹

科兹洛夫对列宁提出的俄罗斯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大国主义”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提法进行了反驳，他通过各种事例指出，在革命前的统计中，难以找到这种能够证明大俄罗斯的某种特权的、似乎是“帝国”地位的、以及它“压迫”我国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指标。大俄罗斯民族的唯一重要优势是它的人数众多。他认为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提出的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的说法，是对民族的歪曲。如果对法国人或英国人这么说，他的政治前途就得结束。²

关于民族自决权，科兹洛夫认为，民族自决权理论的目标是分离，而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体化道路。实际上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它应当促进无产阶级融合成国际共同体，也就是一体化。因此，布尔什维克令人难以置信的逻辑导致了民族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但列宁却竭力以“民族问题”的历史变异性观念来强化这一逻辑，将民族问题的发展分成两种趋势。列宁的观点是提纲式的、抽象的，因为他明显对民族因素的作用估计不足，夸大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国际性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程度。他认为，民族自决权理论不是苏维埃俄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基础”，而是宣传口号，但实际上它又成了布尔什维克民族政策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在政治方面确定相应的民族，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强化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³ 季什科夫院士区分了布尔什维克族裔民族主义学说的两个基准——承认具有各种必要特征的民族群体作为民族的基础和承认存在自己的国家组织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他强调这种学说的乌托邦性及严重后果。他认为苏联民族政策最主要特点就是模棱两可性和矛盾性，思想及其实际落实之间的严重脱节⁴。《俄罗斯历史》杂志主编梅杜舍夫斯基（А. Н. Медушевский）认为，“民族自决直到分离的权利”是苏联分裂的导火线。很多人要回归的真正的（所谓的列宁的）联邦制模式也为这一解体作好了准备。⁵

列宁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民族文化自治”理论的批判的正确性也受到质疑。如有的学者仔细考察了列宁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纲领理解的变化，公正地指出了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对民族文化自治尖锐的消极评价的不得体和错误。⁶

阿曼若洛娃和库列绍夫在《“民族新经济政策”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对列宁的很多提法都提出了质疑。比如关于民族平等。作者指出，列宁所宣布的必须保证各民族平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列宁，尤其是在其最后的著作中，说的不是这种民族平等，而是“无产阶级阶级团结”前提下的民族平等。这就暗指这种平等不属于非劳动阶级。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有明显的矛盾：前面说“保留和巩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后面又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

¹ 参见 Мунчаев Ш. М. Устинов В. М.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2002, с. 13;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Киселева А. Ф. Щагина Э. М.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 XX век. Том. 1. Москва, 2002, с.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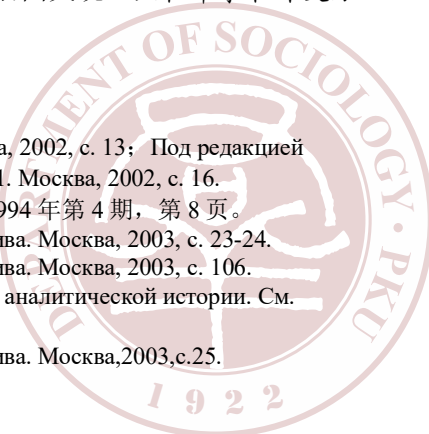
² 科兹洛夫:《民族主义、民族分立主义与俄罗斯人问题》，载《民族译丛》1994年第4期，第8页。

³ 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осква, 2003, с. 23-24.

⁴ 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осква, 2003, с. 106.

⁵ 详见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 Н.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причины крушения СССР с позиций ана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С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1, №6.

⁶ Зорин В. Ю.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облемы, перспектива. Москва, 2003, с. 25.



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具体指的是联邦还是邦联，不清楚。列宁也没揭示他所使用的术语“новый союз”、“новая федерация”的涵义。¹

五、对苏联民族关系史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细化

当今俄罗斯苏联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苏联时期各种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在对苏联时期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点。从事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苏联时期一些不为人关注的、很具体的民族国家建设问题。如玛姆玛多娃（Ш. Маммадова）在《1920-1930 年代苏联国家政策中的库尔德问题》一文中，阐释了 1920-1930 年代苏联民族政策对库尔德族人的状况的影响；安瑙拉佐夫（Дж. Аннаоразов）在《1931 年土库曼游牧民族的起义》一文中介绍了 1931 年土库曼游牧民族反对布尔什维克暴力和恐怖、反对苏维埃化和集体化的起义；丁（Ю. И. Дин）在《1945-1950 年遣返南萨哈林朝鲜人问题》中，研究了南萨哈林朝鲜移民的命运；阿加波夫（М. Г. Агапов）在《布拉金和苏联的犹太民族建设方案》一文中探讨了苏联的犹太民族建设方案的出台及实施情况。捷图耶夫（А. И. Тегуев）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的民族国家建设》一文中，介绍了从十月革命后直到现在的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的民族国家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哈萨克斯坦从古到今土地法律关系的形成及变化也开始受到关注²。

综上所述，苏联解体后，当今俄罗斯的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苏联时期对很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只有一种声音的状况已经不复存在。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有如下原因：首先，国家制度发生改变，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力量掌权，社会趋于多元化。其次，各种新材料、新档案的大量涌现为深入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创造了条件。第三，苏联时期的民族研究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苏联民族关系史研究也主要是政策研究，主要是论证、宣传苏联民族政策的合理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史研究相对独立，开始了对历史真相的探求。

¹ Аманжолова Д. А., Кулешов С.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удьб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нэпа”. См. Россия нэп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2002. с. 60.

² Б. Ж. Абдраимов, С. Ж. Сулейменова, Ш. А. Саймов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земельных прав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Казахстане.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13. №7.

